

唐代政治史 述論稿

陳寅恪

撰

唐振常
導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蓬

萊

閣

叢

書



唐代政治史

述論稿

陳寅恪

■



唐代政治史
述論稿

陳寅恪

撰

唐振常
導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蓬

萊

閣

叢

書

蓬萊閣叢書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寅恪 撰

唐振常 導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書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5 印張 6.125 字數 126,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數:18,001—21,100

ISBN 7-5325-2271-7

K·251 定價:10.00 元

出版說明

中國傳統學術，經歷清後期的低迷徘徊之後，從清末民初起，涌現出了一批大師級的學者。他們以淵深的國學根底，融通中西，不僅擘劃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更開創了一種圓融通博且富于個性特徵的治學門徑與學術風範，而後者也正是當今學術界，經歷了十幾年的曲折後出現的「世紀回眸」熱潮所尤為心儀的核心問題。本叢書輯取其中尤具開創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約請當今著名專家為之導讀，不僅梳理其理論框架，剔抉其精義要眇，更着重揭櫫其學術源流、歷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當時特定的情境與心態，從而在幫助讀者確切理解原著的同時，凸現大師們的學術個性。相信這一設計，會比單出原著，或籠統抽繹當時學風特點，來得更切近可靠。原著是垂範後世的經典之作，導讀為鞭辟入裏的精駭之論，珠聯璧合，相得益彰。這也許是本叢書有別于坊間同類叢書不可替代的特點而彌足珍藏。漢人將皮藏要籍的館閣比作道家蓬萊山，有「漢家石渠閣，老氏蓬萊山」之稱，後世遂稱藏書閣為「蓬萊閣」，因借取而為本叢書名。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學習筆記

唐振常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擬重版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經由寅恪先生長女公子流求來信，命為一文，以作是書導讀。聞悉之下，既感且愧。老師之書，何敢為導。老師之學，何能為導。遲疑而不敢應命者多日，終於執筆寫下這篇粗疏的文字，蓋深感先生辭世二十有七年，先生博大精深之學彌久而愈彰，先生獨立蒼茫之人格精神更見其輝煌，足證人間終有正道，學術尊嚴不泯。弟子不敏，雖不得略窺先生之學于萬一，如能稍作疏解，藉供初學者知先生是書之精要，而能發憤于學，立志以繼先生之事業，則亦或可稍解五十二年前受教而怠學之憾于萬一了。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先生研究中國中古史的傑作，對有唐一代政治史作了最精闢的論述，博大精深，浩浩乎無涯際，綜觀全史，上溯西晉、南北朝與隋世，下訖唐以後之變化。而此浩無涯際的宏觀之學，全從先生精深獨到的研究得來，正所謂從細微處見精神，以小而見大也。錢穆先生論朱熹以

一大儒通考據，事固無難」。移之于先生，亦然。于是，此書之行文也，雖分為上、中、下三篇，實同一貫，由頭至尾，一氣呵成，一脈相連，層層相因，一環套一環，讀至終卷，便能憬然有悟，知先生之精義所在。讀是書者，先應熟讀唐史一過，取得基本瞭解，更應與先生早于是書而作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并讀（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完成于一九四〇年，《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寫于一九四二年，蔣天樞先生《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繫《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于一九四一年作，誤），同時讀先生有關唐史的單篇論文，方能互相發明。

書分為上、中、下三篇，各有一題，而篇之下不另立目，全書行文是一以貫之，每篇行文亦一以貫之，這是先生為文的一向風格，是先生治史而通的表現。實則，細讀之，每篇之內皆各有小題寓于文中，與現在通行的篇之下，復有章、節、目者無異。西方章節式寫史之體，是稍早于先生之前一代人引入，引起了中國寫史之體的變化。先生留學西方多年，于西方史體自極熟悉，而先生熟積于胸中，未曾全然拋棄者為中國傳統的寫史之體，于是，先生博采兩方之長而自創獨特的寫史之法，既有整然之序，主題鮮明，一以貫之，復互相照應，各章有其側重，而又不失之零碎，乃能大小兼備，全局豁然。今之治史者，未必能得先生寫史之法，然必應瞭解先生創法之意。但是，初讀先生書者，或讀書不專心者，于此不免感覺難讀。今寫此文，要旨乃在逐譯并簡化先生之文，并按文意加寫標題，以使讀之者能覺醒目。間以私意加寫按語，略作闡釋。因而，實際上只是一篇原作提要，可以視之為課堂筆記。于先生之學，採述而不作之道，正是我前面說的何敢為導和何能為導之意。文末，附述我

的幾點想法，只是白頭學生呈給老師的課外讀書報告而已。

(二)

上篇 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第一頁至第四八頁）

開宗明義，指出李唐一代史事的關鍵是種族和文化兩個問題。振常按：這是先生治唐史的卓越之見，是全書綱要，全書即環繞這兩個問題而展開論述，層層深入，盡揭底蘊。學者于此必須注意領會。

甲、唐室氏族世系考證（第一頁至第一三頁）

李唐皇室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如高祖、太宗、高宗之母皆胡姓而非漢人，不待闡述，此節專論男系父統之氏族。唐室自稱為西涼武昭王李暉正支後裔。博採諸書，詳加考訂，證明非是，得結論曰：「李唐先世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趙郡李氏之『假冒牌』。」李唐血統其初本是華夏，其與胡夷混雜，乃一較晚之事實也。」

振常按：此節文字，着眼者大，着手者小，為極精闢的考據之作。書中第十一至十二頁引《隋書·經籍志》言宇文泰訂立政策，改易氏族，引起譜序郡望變化，先生獨具法眼，認為這段文字，實是

分別適用於胡人與漢人，文中自「後魏遷洛」至「并為河南洛陽人」止一節專指胡人而言；自「其中國士人」至「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止一節，實專指漢人而言。于此，乃可明白，「李唐之稱西涼嫡裔，即所謂」并令為其宗長，仍撰譜牒，紀其所承」，其改趙郡郡望為隴西郡望（按：先生前文已指出「趙郡李氏是亦華夏名家，又何必假稱出于隴西耶」？），即所謂「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千古未發之覆，得先生一語而決，讀史者應細審之。先生早年寫有《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三論李唐氏族問題》三文，歷經多年，最後形成關於李唐氏族的系統見解。

乙、世系改易歷程及胡漢文化問題（第一三頁至第四八頁）

李唐世系先後改易之歷程既明，進而發現，此世系改易之歷程，實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數北朝、隋唐統治階級之家，莫不如是。于是先生進而論述此中國中古史上這一大問題。

① 關中本位政策由來（第一三頁至第一七頁）

此節從拓拔魏實行漢化政策發端，歷述孝文帝遷都洛陽，漢化達于高峰，而邊塞六鎮之鮮卑及胡化之漢族，則仍保留其本來之胡化，為一善戰之民族，後南向遷徙，入高歡統治之下，高歡遂無敵于中原，成其霸業。其他小部分，由賀拔岳、宇文泰率領西徙，割據關隴，抗衡高氏，分得西北部之地，成北朝東西并峙之局。然宇文泰以少數之六鎮民族，局促關隴一隅之地，終能併吞分有多數六鎮民族且雄據山東富饒區域之高齊，實由所採取的新途徑正確所致，先生對此新途徑稱之為關中本

位政策。關中本位政策開創于宇文泰，隋及初唐因之。唐至武后以後，政治、軍事、社會、文化上的變化，與初唐判若兩端，都由于關中本位政策至武后而廢。先生以大手筆為讀者作了深刻入微的描述。其詳應參《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的出發點，在于融合其所割據的關隴區域內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他胡漢土著之人為一不可分離之集團，使之在物質上處同一利害之環境，精神上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習，方能禦敵制勝。而精神文化方面尤為融合複雜民族之要道。因而以其割據之土依附古昔，稱之為漢化發源之地，不復以山東、江左為漢化的中心。凡屬於兵制的府兵制，屬於官制的周官，皆是其事（府兵制尤為關中本位政策主要的內容）。而前舉《隋書·經籍制》改易氏族之舉，自是執行關中本位政策的例證。接着，先生以宇文泰改易民族的前後兩階段例證李唐氏族稱謂之變易，并舉證北朝、隋唐史料記載諸多李姓的籍貫往往紛歧，即由改易民族之前後兩階段未曾判明。而隋唐皇室之所以始終分別自稱為弘農楊震、隴西李屬之嫡裔，乃由于隋唐皆沿襲關中本位政策，歧視山東人的觀念不變。溯源探微，先生之史學，總使人明白底蘊。

② 漢胡之別，在北朝時代文化重于血統（第一七頁至第一八頁）

此處只是舉兩例以說明在北朝時代，漢人與胡人的分別是文化重于血統，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血統如何，在所不論。先生認為此點為治吾國中古史最要關鍵，如不明白，「必致無謂之糾紛」。先生在這裏稍涉此點，為以後討論種族與文化關係問題先得一概念。

③ 科舉制之崇重與府兵制之破壞，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第一八頁至第二五頁）

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至武后主政，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府兵制即于此時開始崩潰，而社會階級亦在此際起一升降之變動。蓋武后大崇文章，破格用人，于是士子競趨進士詞科。山東、江左之人，有雖工于為文，但以不預關中團體，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變革之際會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之政權尊位，遂為此新興階級攘奪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及武后統治告終，改變關中本位政策之趨勢仍繼續進行，至玄宗朝，關中本位政策遂破壞無遺。安史亂後，中央政府與一部分地方藩鎮，截然劃分為兩個不同的區域，非僅政治軍事不能統一，即社會文化亦完全成為互不干涉之集團，其統治階級氏族之不同類，更無待言。安史亂平，而其部將及所統之民衆，依舊保持其勢力，與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滅亡。在奉長安文化為中心，恃東南財賦以存立的集團中，其統治階級，乃此集團所占地域內的兩種人，一是受高深文化教養的漢族，多為武則天專政後提拔的新興階級，大抵從文詞科舉出身為外廷士大夫；一是受漢化不深的蠻族，或蠻夷化的漢人，多來自邊荒區域，自玄宗朝至唐亡，一百五十年間身居內廷，實握政治及禁軍之大權，而所謂閹寺之特殊階級。故科舉制之崇重與府兵制之破壞，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其時代之符合，絕非偶然也。

振常按：：以上是本節大要，所含內容極豐富，論證極為精闢。本節最後，略為考訂閹寺多出自

今之四川、廣東、福建等省，時為蠻夷區域，而宦官姓氏又有不類漢姓者，故疑闡寺中多蠻族或蠻夷化之漢人。至于闡寺之權日大，以至政柄及君權皆入其手，皇位繼承之權歸其決定，內朝之禁軍及外廷之宰相，俱由其指揮進退，詳于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此處只言宦官之氏族。又，此節論及武則天崇重進士詞科對於唐代政治變遷及社會革命的巨大影響，先生在他書中對此多有論述，如取先生之《元白詩箋證稿》對《長恨歌》的箋證、單篇論文《論韓愈》等并加閱讀，當可明白先生治學功力之深，目光之炬，先生對各種零碎史料如串置散錢、治棼理絲，把唐代的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文學史聯繫起來，一以貫之，論證了大問題。于此，我寫有《談陳寅恪先生治史》一文略作闡述（見《學術集林》第二輯，并見拙集《川上集》），此處不贅。

④ 種族與文化（第二五頁至第四七頁）

振常按：上節既揭載安史亂後中央政府與一部分地方（河北）藩鎮截然劃分為兩個不同的區域，本節即緊接前題，進而論述河北藩鎮實為一獨立團體，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無隸屬之關係，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不以長安、洛陽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安身立命之歸宿。于此提出了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須注意民族及文化二端方能得其真相之卓然論點，發千古之覆。以下所述，以大量例證層層深入證其說之不能易，應深讀之。

例證之一，秀才盧霏年二十不知周公、孔子，只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例證之二，其地暴刑暴賦，唯恤軍戎，對衣冠士人遇如奴隸。例證之三，從韓愈《送董召南游河

北序〕得知，類似董召南這樣有野心而在長安文化區域內不能得意的人，只有北走河朔之一途。例證之四，李益雖登進士而不得意，北走范陽。凡此，足以證明，唐朝後半期含有兩個獨立敵視的團體，此二團體統治階級之種族文化宜有不同之點。進而據〔新唐書·藩鎮傳〕并取其其他有關諸傳之人其活動範圍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相參考，發現兩點：一為其人之民族本是胡類，而非漢族；一為其人雖為漢族，而久居河朔，漸染胡化，與胡人無異。「前者屬於種族，後者屬於文化。質言之，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係也。」但是，河北之地，在東漢、曹魏、西晉時乃文化甚高區域，何以至玄宗文治燦爛之世，轉變成了胡化地域？先生設一假說，以為關鍵在於，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統而最善戰之民族，在當日軍事上本來無與為敵者。後來安史霸業雖不成，然其部將始終割據河朔，與中央政府相抗衡，以至于唐亡。以下，乃以大量史料考證安祿山之為九姓胡（〔舊唐書〕稱為雜種胡人）、史思明之為突厥雜種胡人，及善戰事；更以大量材料歷叙與安、史同時并後來河朔及其他藩鎮胡化事迹，因而作結論云：「李唐最盛之時即玄宗之世，東漢、魏晉、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開始。」先生于此謙虛地說：「此點自昔史家鮮有解釋，茲試作一假說，以待將來之確證，然私心殊未敢自信也。」後之史家，其能繼先生之意以為證否？私心望之。以下，更舉一說，以為河朔之地胡化若斯，則其地必有胡族之徙入無疑，凡居東北與河朔有關之胡族遷居河朔自有可能，而何以此時河朔竟有多數之中亞胡人來居，書中便又展開了新的考證，舉出中亞胡人的遷來出于三種背景，逐一為之闡明。論史至此，可謂至矣盡矣。

丙、本篇結語（第四七頁至第四八頁）

唐代三百年間統治階級之變遷升降，即是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集團的興衰及其分化。李唐初期，皇室與其將相大臣幾乎全出于同一系統及階級，李氏主其軸心，其他諸族人為相，出為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而將相大臣與皇室亦為同類之人，不容別一階級存在。武則天氏族不在關隴集團之內，因欲消滅唐室勢力，遂開始施行破壞此傳統集團之工作，如崇尚進士文詞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制等皆是。此關隴集團遂致分崩墮落（亦有集團本身逐漸衰腐的因素在），至玄宗世全部告成。此時皇室始與外朝之將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將帥屬于不同之階級，而闡寺亦因是變為一統治階級，擁蔽皇室，與外朝之將相大臣相對抗。關隴集團本融合胡漢文武為一體，今既別產生一以科舉文詞進用之士大夫階級，則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學士中選出，邊鎮大帥之職捨蕃將莫能勝任，而將相文武蕃漢進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復合。此皆成于玄宗之世，是以論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為時代劃分界綫。

振常按：先生在此段末句後有語云：「其事（按指以玄宗朝為分界綫事）雖為治國史者所得略知，至其所以然之故，則非好學深思通識古今之君子，不能詳切言之也。」用意極深，且指明了治學之途。先生所謂古者，指宇文泰以來關中本位政策之沿革變化；先生所謂今者，指玄宗朝之狀況。以古視今，以今證古，方能得其本源，納全局于胸中，明白事物之所以然了。先生治史，一向注意變化之迹，此又一證。

中篇 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第四九頁至第一二四頁）

本篇論述唐代政治革命有中央政治革命及地方政治革命兩類，安史之亂以前，地方政治革命均不能成功，且無大影響，何故？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有失敗，何故？唐代皇位的繼承常不固定，新舊君主接續之交何以往往有宮廷革命？外廷士大夫黨派若牛李等黨如何發生，分野界綫何在？等等一系列問題，條分縷晰，因緣乃明。

甲、宮城北門（玄武門）繫成敗之機（第四九頁至第五八頁）

關中本位政策未破壞之前，凡操持關中主權之政府，即可宰制全國，故政治革命，中央可以成功，地方必失敗。蓋太宗「列置府兵，分置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陸宣公奏議·論關中事宜狀）。內外輕重之形勢，與政治革命之關係如是其然。迨玄宗之世，關中本位政策完全改變，地方政治革命始能成功。然在關中本位政策未變易以前，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敗，其故又安在？應之曰：「其關鍵實繫于守衛宮城北門禁軍之手，而北門之重要則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勢使然。」（振常按：先生于此事詳記于《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應參）唐代宮城的建置，宮在城北，故北軍為衛宮之武力，故北門（玄武門）最重要，「唐代歷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悉決于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之勝負，而北軍統制之權，實即中央政

柄之所寄托也。」以下，書中乃詳述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其成敗均以玄武門之得失及屯衛北門禁軍之向背為關鍵。

振常按：讀史者應認真學習先生在本節的考證，更應認真學習先生小中見大的治史之法。宮城北門，初視之，似無關宏旨。北門之得失，不過戰爭之失地與得地而已，先生竟以其「小」而做出了關乎政治革命成功與失敗這樣一篇大文章。每見西方漢學家為文，題目與事件往往很小，誠然他們做得很細，有其長處。但是，其結果常是以小見小，而未能見其大。學者欲窺西方漢學之以小見大，甚難，甚難。先生在此，做出了典範，詳考宮城北門之建置，小也。詳考之，以歷次政治革命之成敗論證之，乃得其大。這就是大儒與鉅釘考據的區別。多年來，史學界常說求歷史發展之規律，為文之際，究竟何為規律，還是疑莫能明，從先生的治史，必然有所啟發。此類論證，在先生著作中，隨處可見，更舉一例，如先生論述唐代古文運動之興起，與文學、文化及政治、社會之關係，着眼在大，而着手在小，乃從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唐人行卷溫卷之文多為「文備衆體，可以見詩才、史筆、議論」之傳奇一段材料而詳加考證，生發開去，做出了學人公認的大學問（參拙文《談陳寅恪先生治史》）。讀此書，宜反覆領會之。

乙、皇位繼承之無固定性（第五八頁至第六九頁）

安史亂後，中央政變除極少破例及極小限制外，大抵不決之于公開戰爭，而表現為在宮廷之內

以爭取皇位繼承的形式出之，於是，皇位繼承之無固定性及新舊君主接續之交輒有政變發生，遂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問題。

以下，即從太宗立嗣之猶豫不決起述，歷記高宗、武后數廢皇儲，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以降，以至德、順，諸朝莫不皆然，皇位繼承皆不能固定，且往往為此而釀成政變。其尤突出堪異者，如玄宗既以大功立為皇太子，其皇位繼承仍不固定。其後雖已監國，并受內禪，即皇帝位矣，其皇位仍不安定，必至誅夷太平公主黨徒之後，睿宗迫不得已，放棄全部政權，玄宗之皇位始能安定。代宗雖有收復兩京之功，其繼承皇位，必待宦者李輔國、程元振合謀誅越王係并其黨與方能擁立，自此之後，唐室皇位之決定，乃歸于闕寺之手。闕寺中又分為黨派，互為爭鬥，皇室子孫無論得繼皇位與否，都不過只是闕寺手中的傀儡工具而已。

振常按：先生此節論述，至于德宗、順宗之交而止，其下順宗、憲宗間著名之永貞內禪事，則以其鬥爭為唐代內廷闕寺黨派與外朝士大夫黨派勾結最顯著的事例，且外廷士大夫最突出的牛李黨爭亦在憲宗元和之世發生，是以留待其後以內廷及外朝之黨派關係與皇位繼承二端合併論證。

丙、士大夫黨派分野之界綫（第六九頁至第九二頁）

① 山東士族與關隴集團（第六九頁至七八頁）

唐代統治階級在關中本位政策未破壞前，除了關隴集團，還有一個與之相抗衡的山東士族。這